

● 新时期陕西文化艺术丛书

新时期陕西文艺论文选

主编 陈孝英 赵宇共



● 三秦出版社

新时期陕西文化艺术丛书

新 时 期

陕西文艺论文选

陕西省文化厅编

陈孝英

赵宇共

主编

三秦出版社

新时期陕西文艺论文选

陈孝英 赵宇共 主编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12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文化厅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8.4印张 131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0546--213--5/I·18

定价：4.50元

序

霍绍亮

现在摆在您面前的，是陕西省文化厅编印的“新时期陕西文化艺术丛书”中的一本。

陕西的三万文化艺术大军，从十年浩劫留下的废墟上起步，在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顽强拼搏，开拓前进，走完了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正在向第二个十年迈步。

刚刚成为历史的这第一个十年，是陕西文艺史上发生深刻变化的十年，是文艺创作空前繁荣的十年。

十年中，我们可敬的艺术家，无论是戏剧家、电影家、电视家、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曲艺家、杂技家，都没有辜负时代和人民的期望。他们以陕西人特有的热诚和执著，投身改革大潮，感应时代脉搏，变革艺术观念，创作出一系列蜚声中国艺苑，甚至饮誉世界艺坛的优秀作品，为三秦父老和华夏子孙争了光，使陕西艺术创作实现了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超越。

十年中，我们许多可敬的艺术评论家、理论家也没有辜负艺术家和广大观众的期望。他们对我省近年来的艺术创作实践给予理论上的总结和指导，并在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

的某些领域内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初步形成了我省理论研究纵横交错的网络。

十年中，活跃在我省各地的一大批可敬的群众文化工作者和文化艺术管理工作者，也以自己默默无闻但却充满创造性的劳动，在各条战线上开拓出一片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为了展示十年来我省文化艺术事业的实绩和进展，我们编印了这套丛书，作为对祖国四十年大庆的献礼。这套丛书的范围，以新时期十年为主，兼及此之前的某些重要史料。其内容包括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各个门类；其形式包括专著、论文集、作品集、年鉴等。我们希望通过收入本丛书的这十几部著作，从一个侧面反映十年来我省文化艺术界阔步前进的身影，留下这支大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开拓、探索所踏出的脚印。

象这样比较系统地编纂丛书，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种尝试，希望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和指教。如有可能，今后我们还想把这套丛书继续编下去，使之成为我省文化艺术事业一个小小的资料库，成为国内外各方人士了解我省文化艺术情况的一个小小窗口。

1989年3月于陕西省文化厅

前　　言

在形形色色的论文集潮涌竞出的情况下，我们也来编这样一本文选并不是为了凑热闹。

有趣的是，本书中的一些文章在几年前发表时曾产生过轰动，今天重读却略觉轻浅了；而某些发表之初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的作品，现在读来反觉意神隽永。

这或许在提醒我们：文艺理论研究应该是对人的生存之美的发现，它必须有助于生命之花的盛开和人类创造性思维的拓展，才能显示出超越时间的存在价值。

因为凡属这样的研究成果，都是萌生于研究主体的心灵深处，流溢着审美发现的光彩，而不是对古今中外他人牙慧的低水平或高水平重复；是对文艺领域某一方面审美感受的浓缩晶化，而不是将一孔之见掺上许多倍水分的稀释放大；是独立主体对献媚奉迎的拒绝，而不是趋时者、唱和者、抬轿者对审美者、发现者的偷换。

新时期十年，陕西的文艺理论研究远远超越了起点不算很高的十七年和赶尽杀绝的文革十年，达到了建国以来我省的最高水平。老、中、青学者并蒂竞出，群星灿烂的新局面代替了少数专家的一统天下。研究的领域囊括了中外古今，既有在现实文艺思潮中切中要害、震人耳目的虎虎力作，又有哲学、美学层次上巧辟新径、与名家相别的拓进之音，近年

来还开始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多元化趋势。

但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陕西的文艺理论研究从主体上讲，还缺乏哲学高度的穿透力和突破思维定势的冲撃力，尤其缺少为了艺术，为了美，敢于标新立异，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学术勇气和殉道精神。

因此，这本论文集便只好保留着历史的胎记和编者的遗憾，就这样和读者见面了，但愿已经开始了的新时期第二个十年能够有所改观。

不过，话说回来，将恒星与流星（只要它是闪过光的）一起照录下来，或许会给后来者以更多的启示。

朋友，你说呢？

编 者 1989年2月于陕西省艺术研究所

目 录

无边与有限	王 愚	(1)
论作家“诗情观念”的形成	畅广元	(20)
幽默艺术规律初探	陈孝英	(40)
中国西部文学四题	肖云儒	(77)
西部——艺术的广阔天地	赵宇共	(103)
为什么必须重视现实主义传统	刘建军	(108)
关于现实主义地位问题的浅识	李 星	(131)
找回失去的自由——中国艺术的根本出路		
	费秉勋	(146)
文学民族形式借鉴创新断思	孙豹隐	(156)
艺术传统与现代化	安 琪	(167)
关于民间文学观念的思索	权海帆	(178)
时代与戏曲表演美学观的畅想	陈幼韩	(183)
审美的无限境界及其人类学本体论涵义		
	尤西林	(204)
现代派：创新的困境与前景	康正果	(220)
喜剧性“怪诞”初探	长 虹	(238)
“距离说”与戏曲审美	终南杨	(251)
生活·表象·意象	高星斐	(255)

无边与有限

——关于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思考

王 愚

—

新时期文学，经过一番喧嚣与骚动之后，一方面打破了过去一段时间单调、划一的模式，呈现出万木竞荣的格局；一方面热衷于各种当代流派的引进和试验，呈现出瞬息万变的态势。究竟怎样估价这种情况，文学界，至少文学理论界，不能不进行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作一些深刻地思考，单纯地欢欣鼓舞和一概抹杀，似乎都难以回答文学究竟向何处去这样严肃的课题。

现实主义，或者说有关创作方法问题的重新提起，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

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提出，时间并不算太长，虽然早在王国维那里，已经出现“写实”这样的美学范畴，但真正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肯定下来并加以倡导的，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

可是，由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大量介绍，后来

是俄苏文学的影响，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又接受了苏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张，现实主义几乎成为衡量文学兴衰和评价作品优劣的唯一标准和尺度。

新民主主义阶段，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由于党的领导同志对现实主义的提倡，现实主义在哲学上和辩证唯物主义成为同一的范畴，在政治上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一致的标准，不但现实主义加上“革命”二字，成为定于一尊的评价当代文学作品的标准，而且整部文学史，也成为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进行斗争彼此消长的舞台。

表面的轰轰烈烈，现实主义的身份确实被抬到最高的位置，但究其实，这并不是美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更多的是政治上的现实主义，从歌颂为主到写英雄人物，从突出政治到重大题材，几乎都是为当时的政治需要和政策方针服务的，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提一下现实主义的道路是广阔的，提一下现实主义有待深化，都会被当作离经叛道之论而大肆挞伐。

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人们虽然不满意过去那种纯粹成为政治附庸的现实主义，但又不能不受长期思维定势的影响，于是初期有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提出，后来又有现实主义发展的主张，基本上还是在现实主义圈子里面作文章，甚至有人主张现实主义精神是贯穿于所有创作方法之中，其实还是把文学的真实性同现实主义混为一谈。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八五年以来，改革、开放的趋向已成为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文学上的引进也自不例外，从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在西欧、北美兴起的各种现代派作

品和思潮蜂涌而来。形形色色的现代派思潮，虽然主要是对西方世界人的异化，物欲横流的对抗和反击，在艺术上则大多是反传统的标新立异，曾经是欧美文学骄傲的现实主义自然在摒弃之列，于是和方法热同时出现的是现实主义过时论，是建立中国的现代派文学的主张。

但是，文学艺术的发展，是各种思潮、流派的互补与渗透，谐调与并存，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推导，也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凡是想在这个领域罢黜百家而定一尊的，几乎没有成功。中外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不止一见。当年法国浪漫派与古典派的对抗，甚至导致大打出手，其结果并没有形成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独霸一方的局面，倒是出现了克服古典主义局限而发展了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的形势。现代法国新小说派的出现，几乎推翻了一切艺术传统，但曾几何时，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的出现，证明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并没有完结。

大概正因为有这样的情况，虽然苏联开国伊始，就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订进作家协会章程，成为作家们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五十年代，还是有西蒙诺夫的发难，七十年代，还是有马尔科夫的开放体系。而在法国则有加洛蒂的无边的现实主义。

这都是想把现实主义修饰得更有弹性一点，以便适应纷纭复杂的文学态势。在我们的当代文学中，似乎也有这样的情况，高喊现实主义过时的，未免过于简单；而坚持现实主义的，又力求使现实主义包罗万象。论其结果，都是对现实主义的取消和误解，并不利于文学的多元和多层次格局的发展。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简单叙述现实主义发展的历程，就是在于重申一条大家都可认同的道理，那就是现实主义是诸种创作方法中的一种，并不能包罗万象，或者说它不可能是无边的；现实主义是文学走向现实的一条重要途径，经过若干代文学家的实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而且还在不断发展，并没有丧失自己的生命力，因此它并不是有限的某几个人的心血来潮。当前，更需要的是从审美意义上，结合当代的创作实践，研讨现实主义的审美特征是什么，它在文学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它是怎样不断发展和丰富自身的。只有在这些方面作出科学的而非臆断的、审美的而非政治的估价，才能有利于现实主义的发展，有利于整个文学的发展。

二

创作方法，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自然不是他的文学活动的全部，但也不是无关紧要的某种技巧和手法。总的说来，创作方法是长期积累的历史发展的艺术地把握现实的原则、态度。这样，才构成了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而不只是单一的一种文学作品。现实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种。每一个文学家，进入自己的创作过程，除了本身的条件（例如感觉、气质、人格等等），总是要从前人的文学实践中接受某种熏陶和影响，然后再加以发展和变化，这就为创作方法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内容。因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地把握现实的原则、态度，尽管随着众多作家的发展它、丰富它，不断趋于完善，但长期形成的一些基本框架、一些审美范畴，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寻的。否则，创作方法没有任何的界定，也就无

所谓是什么创作原则和审美态度了。有的理论家认为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看来，是一种较为宽容的文学观照。但为什么是最好的呢？它同其它创作方法比较而言有什么不同呢？似乎并没有十分详备的论述，起码没有从美学意义上给以说明。当然，人们运用这个概念时，着眼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与真诚的关系，但正象我在前面说过的，仅仅从这些一般文学都具有的特征出发，并不能说明现实主义和别的创作方法的区别，反而会造成方法和本体的混淆。至于从政治上加以肯定，已经实践证明那是违反艺术规律的轻率之论。

这中间，特别是长期以来对现实主义过于宽泛的一种理解：即现实主义同文学的真实性几乎是同义语，而且又从哲学上加以类比，认为现实主义就是反映论在文学上的表现。不仅抹杀了创作方法多样化的可能，而且使文学创作长期停留在摹写现实的层次上。

且不说文学的真实性是否等于简单地摹写现实，或者象新闻报道那样有闻必录。且不说哲学上的反映论有没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缺陷。单就达到文学真实性的途径来看，恐怕就不是现实主义一家的专利。拿我们熟悉的文学史现象来看，《诗经》的传统和《楚辞》的传统，谁也没有怀疑过它们的真实性，但创作方法却是那样的不同，即使在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定于一尊之时，恐怕也没有人把这两部作品都称之为现实主义的作品。

至于哲学上的反映论，解决的是主观与客观、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如果承认文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那它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以从反映论的观点去加以解释，但这包括

整个文学在内，并不单纯指创作方法而言。

弄清这一点事实，并不仅限于概念的准确与否，而是关系到怎样看待文学的目的与方法。文学的目的由文学的特定性质决定，尽管在这方面，由于着眼的侧面不一，到今天也似乎缺乏一个能为大家完全认可的定义，但大体上仍是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文学传达情感，文学表现经验，文学反映现实，文学需要具有社会批判功能等等，都是文学应有的功能。至于如何传达，如何表现，如何反映，当然可以有不同途径。简单的把文学的本质和达到这个本质的方法混为一谈，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会陷于表层化，而且会忽视了甚至抹杀了文学的多样性。

新时期的文学，以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开始，其所以在文学界忽而主张抛弃现实主义，忽而主张复归现实主义，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文学的根本目的和创作方法问题上纠缠不清。更多的是把创作方法视为根本目的，对自身缺乏应有的估价，对别人的创作视而不见，久而久之，只能陷于停滞之中。至于硬要以非文学的力量执行某种创作方法，更常常是造成文坛百花凋蔽的重要因素，前有苏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训，后有我们推行“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覆辙，关心文学发展的人有目共睹，这里就不去多加赘述了。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在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期间，尽管没有出现什么宏中肆外的杆鼎之作，但确实呈现出一派蓬勃的生气，既有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有许多非现实主义作品，但评论界似乎都是以现实主义的框架去研讨这些作品，而把变化仅仅归之于手法的变化，于是褒之贬之，都缺乏一定的指归。象莫言的一些作品，特别是他的《红高粱》系列，截

止现在仍然有人视之为现实主义作品。其实，他重感觉，重民族精神的开掘，不斤斤于细节的逼真，不安份于事实的本色，使他的作品有一股摄人精魄的力量、摧人奋起的风骨，也许更接近于浪漫主义的精神。到了改编成电影之后，许多细节被逼真地转变为视觉形象，常常引起人们的极大争议，究其原因，就在于把创作方法和文学的根本目的混为一起，企图用单一的方法去要求用不同的创作态度、创作原则去把握现实的创造性劳动，不但不能准确评价作家们自身的特点，也常常容易引起无谓的争论。又比如张承志的小说，象《北方的河》，以至于《金牧场》，实际上也是要突现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种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实际上已经不完全属于现实主义的范围，仅仅用现实主义去加以验证，不是责备他没有写出逼真的生活画卷，就是过高估价他的现实主义成就，并以此要求其他真正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作品。

仅仅举出这样两个例证，就可以说明，我们对现实主义的认识，还是要把它放在方法论的角度上，当作一种艺术地把握现实的途径，大体上确定它的美学特征，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促进文学发展的多样化，一方面推动现实主义发展的深化。

从长期的文学实践看，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地把握现实的方法，首先强调的是本质的真实。文学不论是产生于原始人的游戏，还是产生于原始人的劳动，总是人类开始对自身所处的周围世界的审美观照，起初也许是囫囵的感受，随之也许是对异己力量的惧怕与崇拜，待到人类的进步，使得他对自然、对社会都有了仔细而深入的体验，就会有一种愿望创造一个逼真世界以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马克思所

说的，随着劳动，人也就创造着人化的自然，或者是自然的人化，大约就是指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要创造一个第二自然（当然也包括社会，或者可以说，更直接的是社会），在审美思维中，就不能满足于一般地感觉，偶像的崇拜，而是要在日常的平凡的生活中感受细致的、复杂的美，这就出现了大量描绘世态人情的作品，而在诸种体裁中，小说更容易发挥这个长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实主义的最初出现，同小说的发达几乎完全一致。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定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常常限于一般论述，缺乏条分缕析的美学意义的论证，比如说“细节真实”这一点，总是被许多论者一笔略过，其实这是现实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当然，细节的逼真，并不是单纯摹仿现实就能达到的，毫发毕现，只是一种匠气，已为古人所摒弃，细节的逼真重点在于传神。《儒林外史》中范进居丧，十分虔诚，本应荤酒不动，但他去张县令处打秋风，却专挑虾元子吃，事情小到不能再小，平凡到不能再平凡，但却将范进这号儒生的虚伪入木三分地衬托了出来。可见现实主义作品，正是靠维妙维肖的细节，组成丰富多样的生活图画。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细节就是一例，而象福楼拜、托尔斯泰、狄更斯等人的小说，那里面即使写一次宴会，写一次赛马，写人服毒而死，都毫不含糊，有着惊人的逼真。现当代作家中，鲁迅先生的小说，变化较大，但他一贯重视细节真实，三十年代中，有人要改编他的《阿Q正传》，他还谆谆叮咛，阿Q头上那顶毡帽，一定有地道的绍兴特色，否则阿Q也就不成其为末庄的阿Q了。新时期以来，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也都注意到了这个方面，象古华的《芙蓉镇》，湖南山乡小镇的风光，小

吃摊贩的音容，“文化大革命”的气氛，都是由联缀在一起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渲染出来，使人身临其境。其他象路遥作品的陕北高原生活、贾平凹部分作品的商洛山区、李杭育作品的葛川江风貌，大都在细节选择上下了功夫。不要小看这种选择细节的功夫，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没有细致的生活感受，特别是缺乏敏锐的审美眼力，很难写出动人而传神的细节。

当然，本色的逼真现实，只是现实主义的基础，远非现实主义的全部，正象卢卡契曾说过的：“细节的独立化对于表现人的命运，具有各种各样，但一律起破坏作用的后果。”本色的逼真，最根本的是赋予人物以血肉，而这个人物必须是具有深刻社会历史内容的个性。创造众多的鲜明的具有社会历史内涵的个性，是现实主义美学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文学是人类以艺术形式传达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和感情的，自不能不触及到人情世态，但是直抒胸臆是一种表现性，捕捉心曲是一种表现法，以幻想取胜，以怪诞为趣，都是在人身上做文章，都使人们从不同的侧面观照自身的历史发展。但是，表现完整的个性性格，使人们窥察到处于社会历史渗透下个生成、生长、流变的历程，在感情上受到触动，在理智上引起思索，则是现实主义美学的重要特征。从一些现实主义的艺术精品看，包容着深厚社会历史内容的个性形象，是这些作品经百代而不衰，至今仍给人审美满足和思智启迪的重要因素。象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贝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斯汤达的于连，以至于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曹雪芹笔下的宝玉、黛玉、王熙凤，鲁迅笔下的阿Q，都是丰富的、完整的人物性格，正如别林斯基说的那样，每一